

院长前言

我们错了！

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项为时六年，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的运动，所作之研究的成果。虽然倪氏为着他的救主死于共产党的劳改监狱，但他的职事并未因此而消灭。在其跟随者李常受的带领下，倪氏的职事和信息传遍中国，扩展至新加坡和台湾等环太平洋国家，至终及于西方。一九六二年，李氏移居南加州，建立了地方教会，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（LSM）。¹

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，我得悉大量关于邪教、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，一向以为敝组织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，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。已过二十余年，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。但并非总是如此。七十年代早期，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（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）二位研究人士合作，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，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。

事实真相到了二〇〇三年才逐渐浮现。那时，我邀请巴沙迪诺格雷琴和米勒艾略特（Elliot Miller，《基督教研究院期刊》总编辑），一同会见水流职事站的代表。在那次会晤中，我听见他们慷慨的陈词，逐项肯定地方教会被指控

1. 倪氏不愿兴起一个新的教会运动或公会，也认为自己“不过是个弟兄”，而非牧师或领导人，因此在倪氏和任何人之间并无正式的“权力”转移。为这缘故，总是有些人否认李氏领导的正统性，并强烈反对李氏对倪氏教训的领会。我们已检视这些对倪氏教训不同的解释和发展，相信在倪氏与李氏之间并无任何显著不同，也无任何证据指明倪氏与李氏代表不同的教训或教会表显。

否认的真理。地方教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，用自己的话见证他们的信仰：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，却启示于三个永远有别的身位；相信人永远无法在本质上达到神格；相信“他们只不过教会”，而并非“只有他们是教会”。

于是，我展开了一项研究计划，其成果见于本期《基督教研究院期刊》特刊中的加长版封面故事。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，收集第一手资料，甚至远赴中国大陆、台湾、南韩和英国。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、文章、教会文件、影音记录，甚至法庭文件。²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：“我们错了！”

格雷琴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信徒说：“我错了。”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，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。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说：“我错了。”这位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。他们说这话时并非只是一时情感冲动。不！他们是经过多年亲身严谨的研究，才说出这话。

论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，如末世论（由拙作《末世密码》可见一斑），我们与地方教会仍有显著不同；但论到基要的基督徒教义，即殉道者为之抛洒鲜血者，我们则是并肩而立。

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议，并非首次；千禧虫便是典型的例证。一九九九年《基督教研究院期刊》的封面故事标题为“千禧虫之害消除了”。结果，我们被说成是“漠视真理”或“全然无知”，俨如鸵鸟将头埋在沙里。当我在“圣经解答者”广播节目上表示千禧虫甚至不会是二〇〇〇年的十大头条新闻时，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

2. 米勒艾略特和巴莎迪诺格雷琴均参与了一九七〇年代的初始研究，因此具有独特的地位来评估其不足之处。巴莎迪诺鲍伯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去世，因而无法对最新的研究作出贡献。然而，在他过世之前，他同意其妻兼事工伙伴格雷琴的看法，觉得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，并且其结果极有可能断定其初始研究不够完整，甚至是完全不准确。

情绪。一位广播员甚至说，我手上染了上百万基督徒的血，因为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。正在贩卖冷冻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护者，向我大发烈怒；上教堂之人的愤怒也临到我身上，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带领人——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联者——绝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出错。

另一次重大的争议与阿姆斯壮赫伯特（Herbert W. Armstrong）的普世神的教会（Worldwide Church of God）有关。九十年代，我开始与教会领袖会晤；当时所爆发的争议，如今仍历历在目。然而，一九九四年，《基督教研究院期刊》和“圣经解答者”广播节目有幸能首先公开宣告，普世神的教会已走上一条教会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——一条将他们从邪教国度引向基督国度的路。³不仅如此，我有幸能为普世神的教会主席卡客约瑟的著作《被真理变化》（*Transformed by Truth*）撰写前言。如今，他不仅是我的好友，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——走过了从邪教到基督的漫长道路。

在那些日子，我们的事工机构十分感谢邪教专家塔克路得（Ruth Tucker）博士、《今日基督教》的奈夫大卫（David Neff）、阿苏萨太平洋大学（Azusa Pacific University）、富勒神学院（Fuller Seminary）、维真学院（Regent College）向这“重生的教会”所展现的友谊和支持。我们都相信，若是神能借着改变领导人的心，而转变整个运动的方向，那么神更要因着我们向祂持续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。

凭着神的恩典，卡客约瑟能说：“我们错了。”如今，关于我们对倪柝声、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立论，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。

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。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，动机受到挑战，声誉受到攻击，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。以下的说法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：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

3. 卡客约瑟（Joseph Tkach），《被真理变化》（*Transformed by Truth*，Sisters, OR: Multnomah Books, 1997），54页。

领袖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（见封面故事），要求地方教会承认他们错误的教训和实行；这些领袖怎么可能错呢？无疑的，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。

在风波期间，我提醒同仁们，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；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，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场。到头来，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，是因为真理至上！

无论代价有多少，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。这事实我无法忘怀，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：一位中国妇女，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，才刚讲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，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。没有丝毫的自怜，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；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。讲完之后，她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。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。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，与她 and 众多象她一样的人相比，都是微不足道。

或许没有什么话比“我错了”更难启齿。然而，对一个恪守“真理至上”的事工而言，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，而是基本的要求。

汉尼葛夫汉克（Hank Hanegraaff）